

# 中美媒体灾难报道中“英雄”叙事策略对比分析\*

吴柏祥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 315800)

**提 要:**对英雄崇拜的传统今天依然存在。在媒体中,中西方“英雄”叙事的主体都以普通人为主,主要采用相似的简化模式进行“英雄”叙事:灾难-救援-惩罚坏人,但差异同样存在。中国媒体在灾难叙事中更多关注叙事主体——政府部门和官员,中国式英雄也有更多的道德色彩和宿命因素。美国媒体叙述的英雄则有更多民主思想,“英雄叙事”过程体现出多视角、少主观评价的特点。

**关键词:**媒体;英雄;灾难;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9)04-0139-4

##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Hero Narration Strategy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Disaster Report

Wu Bai-xiang

(Ningbo Polytechnic, Ningbo 315800, China)

Today the tradition of hero worship is still strong. In the modern media report,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use the common people instead of superman as the source of mainstream hero. And usually, they use the same narration mode: disaster — helping — punishing the antihero.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Chinese media paid more attention on government agents in the disaster report. Morality comment is common and destiny related narration is not unusual. In American media we can find a lot of democratic ideas and very little morality related narration and comment. Besides, the American media use more focus and witness in their hero narration.

**Key words:** media; hero; disaster; narration strategy

### 1 “英雄”叙事概念的发展

西方的英雄概念源于希腊神话。最初,在荷马史诗中,“英雄指的是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早期自由人,尤指杰出人物:在战争与惊险中出类拔萃的和珍视勇敢等美德的超人。有些英雄的双亲之一也是神;这种半神族出身用于说明许多英雄具有超自然的威力的原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86: 16)。这些具有半神半人特性的西方式“英雄”概念对西方文化研究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维柯把“英雄时代”视为“神的时代”向“人的时代”过渡的时代,强调“英雄”在原始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演进时期具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

卡莱尔(Carlyle)继承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他把历

史上的英雄归纳为“神明、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帝王”(Carlyle 1950: 1-2)等类型。胡克(Sidney Hook)批判这种说法。他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悉尼·胡克 2006: 163),而且“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英雄人物的,不是那些武人或政治领袖,而是像杰弗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们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悉尼·胡克 2006: 164)。

这是西方民主进程之后英雄形象的必然转型:英雄由传奇性向生活、世俗和当代性的转化。而这种转化之后的媒体的英雄叙事也开始和神话传说与文学创作的英雄叙事并驾齐驱甚至有挤占、赶超后者的趋势。这时的主流英雄形象除了胡克所说的“导师人物”之外,普通人

\* 本文系浙江省高职教育研究会资助项目(YB07171)以及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资助项目(20070708)的阶段性成果。

也开始登上以往英雄占据的舞台,开始同台竞技。英雄的舞台也从神秘的远古洪荒变成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舞台。英雄的宝物演化成今天的工具,受害者就是你我,而坏人也不过是自然灾害和隐藏在你我当中的其他的人。

中国的英雄概念其实不同于 Hero,但何时被人拿来对译 Hero,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的英雄概念传入中国之前,英雄在汉语文化中已经有明确所指。《人物志·英雄》开篇就指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刘志伟 2004: 44)。也就是说,英雄是“中华民族人才最高层级代表的意义;突出强调‘英雄’概念的核心内涵是具备‘文’‘武’兼善的全面性能力”(刘志伟 2004: 53)。中国英雄没有西方的半人半神的传承,而是“在圣贤时代之后”到三国魏晋以后出现的具备“兼济天下”的“文”“武”才能都突出的人物形象成为英雄楷模(刘志伟 2004: 53)。这样的英雄是一种“平民式的”,以应对灾难或者危机为主的英雄模式。在遭受外族入侵时,便有了抵御外侮的英雄;反抗体制之时,便有了绿林英雄、革命者英雄;在建设时期,就有建设者英雄和法制时期的执法、护法英雄。这些英雄的出现都是由于对危机和艰苦环境的应对,即社会需要产生英雄。“随着历史的进步,主动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数增加了,教育的普及和个体智能差距的缩小,使人人都可能成为英雄。那种鹤立鸡群、万众瞻仰的人物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高瑞泉 2005: 37),于是我们看到“英雄不再”的社会意义(林信华 2004: 10),看到梁启超的预言:“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高瑞泉 2005: 37)。

这与胡克的想法殊途同归。但中国实用主义英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英雄思想却不能等同。中国英雄的发展除了有环境因素外,还严重受到“天命论”思想和道德约束。“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道家的主流也都是对这种具有支配意义的‘天命’持肯定态度的。庄子指出:‘生死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大宗师》)’。《论语·颜渊》中有一句名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即使今天也可在街头巷尾听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无绝人之路’、‘天时、地利、人和’等格言俚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天命论思想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卜繁燕 翟德耀 2005: 22)。“天命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人英雄观的一部分。

英雄在中国还带有无限的道德考量。没有道德考量的称谓包括超人、高手、杀手、大力士、体育健将、能工巧匠、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爱人、哲人等等。比“英雄”更强调道德考量的称谓则包括“圣人、伟人、君子”等等。“英雄”是平衡以道德取胜的“君子”和

以能力取胜的“超人”等概念的一个概念。

英雄概念发展到今天,中西方的观念已经相当接近。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英雄也已经走下神坛。但在两种文化当中,差异还是存在的,即中国的英雄有更多的道德色彩和宿命因素,而美国的英雄则有更多民主思想。

## 2 灾难事件中媒体使用的“英雄”叙事模式

英雄成为英雄,除了英雄本人杰出能力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灾难环境或者“坏人”的存在。因为“坏人”的恶行而出现受害者,于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之所以完美,是由于我们在叙事上有了更多建构“英雄”和建构“坏人”的因素。这些要素或者支持或者反衬英雄的伟大。普罗普(Propp)把这种功能中的二元对立总结为:英雄——寻找某物、遭难、受苦、被遣、得助(神奇的力量)、女主人公(得救)、表面上的坏女人、爱情、年轻的(儿子)、英俊、个人主义者、想象、发明、找到捐赠者、得胜,坏人——阻碍英雄、惩罚英雄、使英雄经受苦难、参与侦查、有亲信(邪恶的技巧)、女巫(对英雄施魔法)、使人看清假英雄的邪恶和淫欲、老(父亲)、丑陋(通常很怪诞)、集体主义者、技术和人力、阻碍寻找捐赠者、被打败(阿瑟·阿萨·伯格 2006: 25)。

新闻报道通常不像文学作品那样使用大量笔墨来对“英雄”和“坏人”进行复杂建构。Lakoff把这个模式简化成“恶势力、受害者和英雄”三个主要因素,并赋予适当特征(Lakoff 1992: 95 - 111)。叙事模式也简化为:灾难-救援-惩罚坏人。一般采取系列报道模式,最终完成对“英雄”和“坏人”的建构。

英雄叙事至少包括构建“英雄”和构建英雄的对手“坏人”两个方面。在灾难叙事中,“灾难”本身成为诞生英雄的背景,救援过程实际上是构建英雄过程。拓展了的救援过程实际上包括从施救过程经过善后过程到教训与预防措施讨论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体通过聚焦手段发现“英雄”,通过反复聚焦、改变视角等叙事手段强化“英雄”形象。

描述灾难实际上是构建“坏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一种逆向建构英雄的过程。Rojo把“坏人”的构建过程归纳为两个步骤:首先通过进行彼此阵营的划分形成我们的阵营和对手阵营,进后者的自然成了“坏人”;其次,通过赋予负面特征并声称他们不遵守社会共同价值观而摒弃某人或者某些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坏人”。还有一个补充过程:采取分化策略(通过某种程度的正面叙事手段)拉拢某些因素使之进入“我们”的阵营。站在对立立场上的媒体都通过这种的模式来概念化冲突和冲突中的人物(Rojo 1995: 49)。

媒体的另一个手法是不聚焦“英雄”而仅仅对这一过程的其他环节甚至“坏人”(灾难)本身进行“聚焦”,从而

创造“潜在英雄”——媒体自己。媒体在“客观”叙事的同时从来就不曾忘记把自己叙述成英雄。“1999年河北省新闻舆论监督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及“发现违法乱纪的人和事向谁举报”时,有42.9%的人选择向《焦点访谈》反映,这一比例比选择向纪检、司法部门反映的比例还高”(邹建达 李宇峰 2008: 120)。

### 3 美国媒体的相应叙事模式

在本文选取的《纽约时报》7天1341篇新闻报道中,关于车祸造成灾难的报道共有33篇,占2%,远高于新华网的1%新闻报道的比例。在全部33篇新闻报道中有两篇直接报道该次灾难中出现的英雄: Jeremy Hernandez是他帮助打开车门并把50名孩子递出到车外救援人员手中。其中,一篇是长篇 *Stunned Victim Turns Hero* (《纽约时报》2007年8月3日),共有1150字,详细报道英雄救人的全过程;另一篇是282字的短篇,报道有学校向英雄提供奖学金。

在那篇长篇新闻报道中,作者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段对英雄进行全方位建构。首先,作者使用全知视角描述英雄行为:“他开始剧烈心跳,之后越过两排座位,踢开车门,把孩子们一个个递出去,递到外面排成一列纵队,像是救火队员”。其次,作者开始聚焦,并直接引用英雄的话语: Jeremy Hernandez共有5次直接表述: (1)“我忘记是怎么做的,我感觉自己仅仅是在机械地在动”; (2)“孩子们都认为他们必死无疑。他们想他们的父母”; (3)“我下过这条河,我不想就这样下去”; (4)“感觉时间像是到了永远。我把孩子们抓起来,递到车下”; (5)“我妈妈住在对面,所以不得不经常过桥。我打算投资一份地图,我要绕过这座桥”。最后,作者通过 Angi Haney等11个相关人物的表述进一步构建英雄。限于篇幅,具体分析从略。分析发现,在《纽约时报》8月3日(事故发生第三天)所作的这篇专题英雄报道主要使用以下叙事手段建构英雄: 1)多视角客观描述英雄; 2)叙事主体是来自于现场多位人物的直接观察后的直接表述; 3)英雄话语的直接引用主要用于表述英雄事迹实现过程的心理活动描述,是对客观视角的补充。

在另一个短篇中,作者报道有学校提供给 Jeremy Hernandez全额奖学金一事。但由于“未能采访到他本人而不能直接引用 Jeremy 的评论。另外一位关系密切的人士介绍了他得知奖学金一事的反应,但也只是说他很惊讶。此外,该人士还介绍,当美国总统布什的人联系他拍一张照片时,他仅仅简单说了声“不”予以拒绝。

### 4 中国媒体的相应叙事模式

在新华网从2007年6月15日到21日7天里面发布的4118篇报道中,关于九江大桥断桥事件的报道共42

篇,占1%左右。其中,直接描述英雄报道的也有两篇:《九江大桥断桥后10分钟两位老人舍命拦住了8辆车》(20日)和《九江大桥事故中见义勇为两兄弟各获2万元慰问金》(21日)。后面的报道有574字,介绍广东省和中山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给中山农民梁福根、梁华根两兄弟颁发奖金。前者是一篇1396字的报道,介绍两位河南老人谢凤运、王文田英雄事迹的全过程。文章采用全知视角的描述主要有两处: (1)“他们向过来的车辆挥着手,操着浓厚的河南话,声嘶力竭地喊:‘前面的桥垮了,你们不要过去了!但不少车主听不懂他们的话,反问:‘干嘛,打劫啊!’”; (2)“开车的刘金行凭直觉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刻刹车,卸档位,想停下来看看个究竟。因为夜黑雾浓,他隐约看到了前面滔滔的江水,觉得很奇怪:‘水位一夜之间咋就涨过了桥面呢?’”

采用英雄们本人的直接引语贯穿全文,共10处: (1)“路过九江大桥时,因为雾很大,我就给开车的女婿刘金行说开慢点”(谢凤运); (2)“水位一夜之间咋就涨过了桥面呢?”(刘金行); (3)“天啊,桥塌了,在大桥坍塌处的水面,一艘大船尾部翘起,头部扎在江里。而刚才那两辆卡车肯定是已经掉到江里,完全不见踪影了!”(谢凤运); (4)“太可怕了,要不是刹车及时,我们的车也早就跟着掉到江里了”(谢凤运); (5)“俺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可掏出手机却发现没电了”(王文田); (6)“当时没想到危险,只想着要拦下过来的车”(王文田); (7)“这个(掉头走)俺倒没寻思过。你说,咋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往江里掉呢”(谢凤运); (8)“那么匆忙,哪有时间去记那些(记住被救人的车牌)”(王文田); (9)“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只要是人都都会这样做的”(两位老人); (10)“俺几个还要到神湾废品收购站去收货,不能再聊了,否则今天就晚了”(谢凤运)。可见,在《九江大桥断桥后10分钟两位老人舍命拦住了8辆车》中,作者主要通过直接引用角色语言构建一个相对主观的英雄搭档。

在全部42篇报道中,除了对4位英雄聚焦外还有16个主体被叙述或者提及,比如广东省政府、广东海事局、交通部、省政府事故调查组、当地交通部门、广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等。限于篇幅,对这些主体及其话语分析从略。不过,研究发现,新华网的作者报道事故时,主要报道与灾难相关的各个主体活动的情况,“英雄”只是在众多“主体”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英雄建构”是在报道众多主体的框架内实施的。

### 5 中美媒体相应叙事的对比分析

通过前面介绍可以看出,“新华网”的聚焦与“英雄”叙事同《纽约时报》相比,具有很大差异。

差异之一是两者聚焦的对象不同。“新华网”花了很多笔墨来聚焦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而《纽约时报》对“新

华网 极为看重的聚焦点采取回避策略。

差异之二是“英雄”的选定。两种媒体都选定普通人的事迹作为其“英雄叙事”的重要环节。此外,新华网的叙事多采用政府部门和官员作为视角,而《纽约时报》则更多通过媒体视角来聚焦灾难,即把媒体本身作为“潜在英雄”进行建构。何为“潜在英雄”?进行灾难叙事的媒体有时往往仅仅进行“灾难(构建坏人)-教训与预防(可能的英雄叙事)-责任追究(惩罚坏人-构建未来英雄)”等环节的“英雄叙事”,而有意省略“建构好人”环节。在《纽约时报》33篇新闻稿中,有灾难描述10篇,教训预防9篇,责任探究5篇,合计24篇,占72%。这些叙事文本形成了对“坏人(灾难)”的潜在责难,但没有明确建构“英雄”,所以属于潜在的对媒体的英雄建构。

差异之三是“英雄”建构的方法问题。第一,在对“英雄”Jeremy Hernandez的建构过程中,作者通过使用11位见证者的聚焦和全知视角建构出一个完美英雄。而新华网对谢凤运、王文田的“英雄”建构,则主要通过直接引语方式来完成。第二,在描述Jeremy Hernandez的英雄事迹时采用动态叙事过程:作者通过全知视角、直接引语、相关人员的聚焦从而动态再现整个营救事件的全过程。而《新华网》对谢凤运、王文田的描述主要采用多幅“静态图画”。在《九江大桥断桥后10分钟 两位老人舍命拦住了8辆车》一文中,三个小标题即为三幅静态构建英雄的图画:断桥处上演生死时速;宁被误为“劫匪”也要舍命救人;“昨能眼睁睁看着车往江里掉呢”?第三,作者对英雄的道德评价方法不同。作者很少直接从道德维度评价Jeremy Hernandez。在《塌桥英雄获得奖学金》中,作者提到一句看似与道德无关的话,就是Jeremy Hernandez直接拒绝总统的人拍照片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一切评说都通过事件描述、英雄自己的说法、相关人员的口述来表达。而这些表达通常也与直接道德评说无关。然而,新华网中直接的道德评说非常多,比如上文提到的小标题“宁被误为‘劫匪’也要舍命救人”就是一例。

## 6 结束语

“英雄”概念发展到今天,中西方的观念已经相当接近。传统的“神话英雄、豪杰英雄、军旅英雄”或者如Carlyle倡导的“神明、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帝王”等传统英雄已经开始让位于今天的民主、以普通人为主的劳动英雄。但在两种文化中,差异依然存在:中国的英雄有更多的道德色彩和宿命因素,而美国的英雄则有更多的民主思想。这种草根英雄非常依赖媒体的报道。“通过报道,媒介对英雄进行了加冕,并通过现代信息广泛传播,使英雄和英雄行为家喻户晓,媒介的英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英雄的验证体系”(邹建达 李宇峰 2008:120)。

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传统英雄赖以生存的土壤。依靠媒体对“灾难”等现代“坏人”的建构,现代“英雄”才得以生存。与文学英雄叙事模式不同,媒体主要采用一个简化的模式叙事英雄:灾难-救援-惩罚坏人。一般采用系列报道的模式,最终完成对“英雄”和“坏人”的建构。

中美媒体采取的英雄叙事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一是两者聚焦的对象不同。“新华网”花了很多笔墨来聚焦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而《纽约时报》对媒体本身和普通人物的“英雄”建构着墨很多。二是建构“英雄”的方法不同。首先,新华网对英雄谢凤运、王文田的建构主要通过直接引语的方式来完成。而《纽约时报》在对英雄Jeremy Hernandez建构过程中,通过多位见证者的聚焦和全知视角的使用建构出一个完美的英雄。其次,《新华网》文章多采用“静态图画”描述手段,而Jeremy Hernandez的英雄建构主要通过动态叙事过程进行。第三,作者对英雄的道德评价方法不同。作者很少对Jeremy Hernandez进行直接道德评价,而新华网直接的道德评说则非常多。

## 参考文献

- 阿瑟·阿萨·伯格. 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高瑞泉. 英雄的历史作用——读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J]. 历史教学问题, 2006(5).
- 悉尼·胡克. 历史中的英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林信华. 英雄不再的社会意义[J]. 甘肃社会科学, 2004(2).
- 刘志伟. “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 卜繁燕 翟德耀. 《子夜》的英雄悲剧叙事模式[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6).
- 邹建达 李宇峰. 英雄的叙事与叙事的英雄——论当代新闻叙事中的英雄母题与英雄情结[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5).
- Lakoff, G. Metaphor and War[A]. In Hallet, B. (ed). *Engulfed in War: Just War and the Persian Gulf*[C]. Honolulu: Matsunaga Institute for Peace, 1992
- Martín Rojo, L. Division and Rejection: from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Gulf Conflict to the Demonization of Saddam Hussein[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995(6).
- 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